



SUWEI

郑异凡 著

SHEHUIZHUYIGONGHE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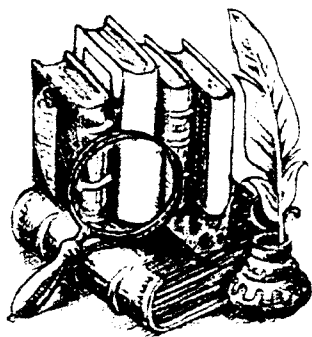
LIANMENG 不惑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不惑集

郑异凡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惑集/郑异凡著.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5
ISBN 7-5382-6003-X

I. 不… II. 郑… III. 苏联-现代史-历史事件-研究-文集 IV. K512.5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871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364 千字 印张:16 $\frac{1}{2}$

印数:1—3 000 册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之江 胡大为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杜江

定价:34.00 元

自序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苏联历史。如果把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算在内,可以说苏联史学了不下三四遍。但是说实话,并没有真正读懂这部历史,装进脑子的大多是一堆经过精心剪裁和修饰甚至篡改的事件、日期和公式,简而言之,就是那一套“斯大林模式”。诚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们已经开始揭露过去的某些问题,但还没有真正触动斯大林模式。然而即使赫鲁晓夫所揭露的东西,中国人也并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赫鲁晓夫在“大反斯大林”而已。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我们仍在“坚持和发展”斯大林的事业。苏联30年代有大跃进,我们有自己的“大跃进”(连名称也是一样的);斯大林有“全盘集体化”,我们有“人民公社化”。事情竟然如此相像,苏联紧接着集体化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而我们在公社化之后也出现了三年的“灾荒”。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我们清醒过来,于是像他们30—40年代的大镇压(我们把它叫做“肃反”或“肃反扩大化”)那样,我们搞了一场后果决不在其下的“文化大革命”。苏联人的错误,即使他们自己已经看到,已经

指出来,但我们还是不相信,还得按照人家过去所走的错误道路走下去。世界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人的错误,不足以警醒本国,只有自己再做一遍,才能记取教训。恩格斯老人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中国人开始读懂苏联历史可以说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至少本人是如此。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了第一篇,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就的。“四十而不惑”!我正是进入四十后才开始读懂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在苏联历史面前才开始了“不惑”的过程,写一些解惑心得的文章。这自然要归功于我们的各种“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它们打开了我的眼界和思路,促使我去认真思考过去所学到的东西。只是通过这场“革命”才真正懂得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只有经历了这场“革命”,才会去反思过去被我们看作“金科玉律”的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公式、定律和法则。

我只能说是“开始不惑”,因为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虽然说来惭愧,此后又走过了“知命”甚至进入“耳顺”之年,但不惑的过程仍在进行之中。72天的巴黎公社,给后人提供了多少研究的课题,而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和教训,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所无法穷尽的。大量长期被藏之于密室的档案的解密公布,也迫使我们许多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作出新的评价。

我的文章并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去剖析斯大林模式或苏联体制。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某些具体的人

物、事件、观点和时期的研究上。这是因为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太多了,被有意无意篡改歪曲的东西太多了,有待于一个一个地进行清理,许多事实不得到澄清,大量问题不弄清楚,是很难进行理论概括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有大量理论是非有待正本清源。因此在研究的选题上自然首先把诸如“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问题放在了首位,这既是我本人重新学习的需要,也是史学界、理论界拨乱反正的需要。斯大林模式是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一种模式,但要对它的是是非非作出评价,孤立地就斯大林论斯大林是远远不够的。要弄清斯大林问题必须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之中,把他的所作所为同他的同时代人进行比较,看看是比他们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这样就需要研究列宁,特别是列宁后期思想,需要研究布哈林、托洛茨基等等斯大林的“战友”或者说“对手”和“敌人”的思想和活动。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的存亡问题越来越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的部分文章开始联系到苏联的命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怀着不安的心情提前一个多月为苏联写就的挽歌。一个历史学者眼睁睁地看着研究的对象国消失,这是可悲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未始不是“好事”——苏联已成为完整的历史时代,历史学家可以放手去写前朝史了,他们面临着书写一部详实可靠的苏联兴亡史的历史任务。什么时候我们能读到像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那样的大手笔的巨著呢?

我的某些观点引起过争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它有助于问

题的深入研究,例如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不同的意见促使我去寻找布哈林的原著,查看列宁的所有有关论述,特别是后来发表的有关资料,从而使自己的认识建立在更坚实基础之上。只要是从学术探讨出发,而不是存心扣帽子、打棍子,这种学术争论是必要的,有益的。

学术研究是要报刊和出版界的大力支持的。收入本文集的几篇较有分量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世界历史》杂志上。这里我首先要特别提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朱庭光先生。他主持的杂志支持学术探索,开展百家争鸣,为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没有他的大力支持,我的某些文章恐怕是难见天日的。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有关布哈林的论文为后来的《布哈林论稿》打下了基础。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则是在当时理论部的汪子嵩先生的“逼迫”下写出来的。那时往往是他出题我做文章。为写文章不得不翻阅一些俄文资料,结果不仅写了文章,后来居然还编出一本《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已故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林基洲先生对我研究列宁的晚期思想给以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校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的译文,这既是推敲译文的过程,更是研究列宁思想的过程。我参与组织的几次列宁晚期思想研讨会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召开的。研讨会为学者们交流心得,相互切磋提供了很好的场所,也使我受益匪浅。从60年代起有幸结识了沈昌文先生,我们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我编译和写作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包括本书在内,就是在他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得以问世的。我在这里提到这些先生,并不仅仅是想按照惯例表示一番谢意——尽管感谢是完全应当的,而是想强调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

的学术研究需要有这样热心、开明、负责的领导和朋友的扶持，需要各界的合作！

关于本书的体例需说明一下。本书对文章本身除了改正刊误以外，没有改动。但引文如保持原样，对读者未必方便。因此，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引文均改为中文第二版的译文，《列宁全集》改为中文第二版，《列宁选集》改为中文第三版，在引用出处时不再一一注明。只有个别地方我选择了旧的译文，有些地方还保留了俄文版的出处，这在注释中都有交代。新版译文比旧版有很大提高，但继续完善的余地当仍不少。所幸译文的订正并未影响文章的结论。

郑异凡

1999年5月

于北京北太平庄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目 录

自 序

1861 年俄国农奴制度的崩溃	1
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	31
恩格斯喜欢“一无所有”吗	38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	41
文化继承问题的一场论战	49
列宁怎样领导文艺工作	57
苏联建国初期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论争	63
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	103
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126
怎样理解“进一步,退两步”	149
敌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	151
“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	160
“列宁主义”一词探源	174
列宁“遗嘱”和接班人问题	188

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

——列宁病中活动之一····· 207

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

——列宁病中活动之二····· 222

要从全局上研究苏联现代史····· 249

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消除····· 251

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277

附录一 朱庭光:没有必要作茧自缚····· 302

附录二 郑异凡:敢于解放思想,不要“作茧自缚”····· 308

帕尔乌斯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 311

列宁谈文艺问题的一段新译文应当订正····· 319

由革命进程解决的分歧····· 32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335

布哈林和“布哈林案件”····· 356

“全民国家”

——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 379

列宁“遗嘱”考····· 389

关于列宁“遗嘱”的新材料····· 413

合作化·社会化·集约化

——谈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417

列宁《论合作社》译文的几处重要修改····· 421

新思维:历史和现实

——读戈尔巴乔夫的两篇新著····· 425

社会主义的加和减····· 437

布哈林研究在中国····· 447

加强苏联史的研究

——读《社会主义大辞典》····· 454

“全集”不全	
——读《斯大林全集》杂记·····	464
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由来和发展·····	472
苏共新党章中的三个重要问题·····	478
从历史看未来	
——略谈苏联的民族问题·····	486
无需翻译及其他·····	491
得民心者得天下	
——列宁和十月革命·····	49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成立到解体·····	508
СОДЕРЖАНИЕ·····	523

1861 年俄国农奴制度的崩溃

1861 年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此后俄国的历史便正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俄国第一号大农奴主亚历山大二世“自愿”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一世纪来一直被沙皇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捧之为“施仁政”，把它说成是政府和“有教养的社会”贤明慷慨的结果。他们称亚历山大二世为“沙皇—解放者”，在各种著作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历史，马上可以看出，这第一号农奴主是如何在革命的威胁下、在溃灭的恐怖下被迫签署“解放”法令的。这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它教给我们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它也从反面指出了被压迫人民争取真正解放的道路。本文准备就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废除农奴制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俄国的农奴制始于 15 世纪，到 18 世纪已发展至顶峰。叶

卡捷琳娜女皇于 1785 年颁发的《给贵族的恩许状》上集中地记载了农奴的法权地位：农奴不能拥有不动产，不得从事包销包工，未经地主同意不得从事手工业，不得签订债务契约；地主可以把农奴流放充军或送服苦役，而农奴无权控告地主，等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 19 世纪农奴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成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终于不得不在日程上提出了农奴制的废存问题。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因素。机器开始在工业部门中得到广泛运用，出现了蒸汽动力，并开始在工业中应用，这促进了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过渡。铁路和航运也随着发展。与之相应，在 19 世纪上半叶逐渐出现了自由雇佣工人。

劳动的社会分工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城市人口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急剧增长上，据统计，1796—1856 年间城市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各经济地区的日益专业化上。当时中央各省已在向工业方面发展，南方各地种植谷物，从事牧畜业，西北各省则经营技术作物。地区的分工又促进了交换和市场的发展，到改革前后，国内集市总数已达 6 500 个，其中有 33 个以上是流转额为 100 万卢布以上的大集市，最大的尼日哥罗得集市流转额达 11 500 万—13 000 万卢布之巨^①。同时，国外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也要求俄国农村出口大量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农村自给自足经济在逐步瓦解。

但是工业中存在着大量廉价的农奴劳动力，这使许多企业主不愿采用雇佣劳动，而这些农奴由于文化水平低，根本不能满

足近代工业对生产者的要求。国家的订货及垄断价格排除了自由竞争的可能性,但却为他们保证了高额的利润。正因为这样,直至改革前夕,像乌拉尔、阿尔泰及莫斯科附近采矿工厂仍有20万人(占总数81%)不是自由雇佣工人^②。而其恶果是严重的,例如19世纪30年代俄国的生铁熔铸量约占世界开采量的12%,略逊于英国,但到50年代末却降至4%,而英国则占50%以上^③。由于农奴的购买力低,缺乏广阔的市场,也限制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工业的发展向农业提出了新的任务,刺激了农业的发展,激起了地主为出售而生产粮食的兴趣。19世纪初较先进的地主已开始探索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道路了。他们设法改进耕作方法,向外国购买和自己试制农业机械,试验采用机器耕作。但是在农奴制度下使用农业机器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还在19世纪初就有人提出在农业生产中以自由雇佣工人来代替农奴劳动,以资本主义经营来代替劳役制的问题。如十二月党人H. И. 屠格涅夫在《赋税理论之实验》一书中就公开宣称:“奴隶制度的存在妨碍着俄罗斯的进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也在逐步发展,特别是在西南各地区。这些地区有大量肥沃的荒地,离国际市场也较近,农奴制关系比较不发展,资本主义所遭到的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就首先出现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使用机器和雇佣劳动力。在其他地区的地主经济中也逐渐出现一些使用雇工的现象。

19世纪上半叶,法令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买卖土地,因而出身于商人、市民及农奴的土地所有者有所增加。这些人不能使

用农奴劳动,其提高生产、增加收入的惟一办法是改善经营,采用机器,使用雇佣工人。这是农业中的一支资本主义新军。

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改革前俄国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时,不能不看到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农奴制经济,和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俄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很慢的,其资本主义成分虽不断增长,然而在量上还是处于劣势,并且经常受到农奴制经济的压制。

封建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障碍。以19世纪中叶欧俄地区为例,103 000—105 000名地主共有10 500万俄亩土地,其中只有3 570万俄亩归地主农奴使用。国有土地共7 900万俄亩,而人口总数达900万的国家农民的份地只有3 700万俄亩^④。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封建贵族地主手中,这就使供经营资本主义农业用的土地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由于土地供给量少,因而土地价格昂贵,影响资本主义经营者的利润,从而影响工农业的扩大再生产。

农奴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农奴主对农奴的半所有制。地主分给农奴一块份地,从而把农奴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列宁所说:“不是‘保证’农民获得生活资料,而是‘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⑤同时农民在法律上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迫使农民在耕种份地的同时还得去为地主做工,即实行所谓超经济强制。当时俄国地租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劳役租和代役租。与地租形式发展的一般趋势不同,在俄国不是从劳役租向代役租转化,而是两者并存,而且在改革前一直是劳役租占优势。这种建立在超经济强制上的劳役,为农奴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对广大农奴主来说,改善经营,花大量投资,

实行机械化的大生产是不合算的。对地主们来说,问题只在于如何加强对劳役的压榨,如何把农奴为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那一部分也尽可能地占为己有。劳役租的数额增加了。17 世纪农民为地主耕 1 俄亩,为自己耕种 3.4 俄亩,到 18 世纪中叶已增为 1 比 1,而到 19 世纪土拉、梁赞及其他农业省份许多地主在夏季竟将劳役延长至每星期 4 天、5 天甚至 6 天^⑥。农民每星期要为地主耕作这么多天,当然不可能去改善和提高自己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地主土地上的生产率之低也是可以想见的。地主主要增加收入,只有夺取农民的份地,结果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变成一无所有的“月役工”。服这种“月役工”的农民用地主的工具为地主耕种,按月从地主那儿领取微薄的口粮度日。19 世纪上半叶农民的份地每人平均减少了 1/2—2/3。在莫斯科、梁赞、库尔等省平均份地面积已不够养活家庭,即已不足以维持地主的劳动力及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事实本身就破坏了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基础,但是失去土地的农奴沦为实际上的奴隶,这使资本主义企业仍然无法获得必要的自由劳动力。

服代役租的农奴状况稍好一些,他们交过一定数量的货币地租后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可以去独立经营农业或工业。但是,代役租也在逐年增长:18 世纪 60 年代每人平均为 1—2 卢布,到 18 世纪末已达 10—12.5 卢布,而至亚历山大第一统治的后期已增至每人 30 卢布^⑦,即使把 19 世纪卢布贬值估计在内,其增长也是无可置疑的。在工业区有每人多达几百银卢布。所以代役租农奴中虽有分化,但是高额的租金妨碍了资本的积累,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其中有一部分农奴分化出来,往往也开办些工业企业,有的成了富农,有的成了工

业家,有些人还不惜巨资赎得了人身自由。不过赎得自由的农奴究竟是极少数,而不少企业家、富农依然是农奴,每年得交纳大量的代役租。但是在缴付代役租的条件下被准许外出做工的农奴,农奴主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把他们从工厂企业中召回。厂主雇用这种所谓自由雇佣工人,必须将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农奴主,因为代役租是当时为进行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资金之一部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扩大再生产。农奴主的这种权利也影响了熟练工人的培养。这都不利于工业的发展。列宁指出,“农奴制是乌拉尔停滞的主要原因”^⑧。这也是 30 年代已经开始了的工业革命迟迟不能完成的原因之一。

上述一切表明,无论在哪一个经济部门,农奴制都成了继续前进的障碍,这一事实迫使俄国统治者必须考虑今后的发展前途。实行改革远非亚历山大第二突然想出的办法,在这以前,俄国的几个统治者早已出现过这种念头,并且作过某些枝枝节节的改革尝试。例如 1803 年法令允许地主在私人协商的基础上连土地解放农奴,1804 年禁止在市场上不带土地而出卖农奴等等。在尼古拉第一在位的 30 年间(1825—1855)前后曾成立过 11 个解决农民问题的各色各样的“机密委员会”,但是这些委员会都没能根本解决农民问题,只作了某些微小的改良,既没触动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动摇农奴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即使这样,尼古拉一世也没有坚持下去,还在 1858 年马克思在《关于在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一文中就已指出:“在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并不是由于什么人道观念,而纯粹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企图用和平方法改变人民群众的状况,但是他们两人都失败了。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在 1848—1849 年革